

风景这边独好

——读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

郭 可

Résumé :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rédigé par Jean Charbonnier, a le mérite de faire sorti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l'oubli des chrétiens chinois et de nous ouvrir le panorama d'une grande 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关键词：中国 基督教 开放

“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当地的天主教徒，应该是天主家庭里的成员，是它神国里的人民；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开自己的祖国，却仍是那个国家的人民。” [1]

基督教来华史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然而这类著作多为传教史：外国教士在哪里占据了地盘，遭遇了什么事情，福音事业有如何进展等等，中国教徒往往被当作配角对待而受到轻视。有人坦言“无疑是外国传教士们将基督教传入了中国，如同有关佛教徒和穆斯林们的情况一样，但却是中国人自己得以在这种基督教中辨认出有可能使他们扩大、美化和强化自己文化传统的因素” [2]。有感于此，并出于为语言所困的研究者提供一份中国基督徒史详实资料的责任感，法国神职人员沙百里博士撰写了这本《中国基督徒史》。

《中国基督徒史》追溯了一段很长的历史。近人陈垣曾将基督教入华的历史分成四期：“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的耶稣教” [3]。中国基督徒的历史也是循着这样的脉络讲述的。早在七世纪，唐朝的太宗皇帝就接待了来自波斯的基督徒使者并组织人在长安翻译经文。西安府千年的景教碑至今仍闪烁着“天国”来临的最早光辉。景教取得在华的“公民权”，但本土教徒已无从可考。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会提供支持，国内的教堂由第一批拉丁籍的传教士主持。他们带领肤色不同，装扮迥异的基督徒为大汗辽阔强大的帝国祈祷。然而，基督教义为伦理宗法制社会中的“灵魂”——儒士阶层接受还需等待很长的时间。十六世纪末的明王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一批有开放胸襟与务实精神的文人士大夫把目光投向耶稣会士带来的先进的西洋科学，他们期望藉此拯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于是，他们接受西方科学的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这是中原大地上第一批基督徒。他们爱教更爱国，因而经历了曲折多艰的命运。后来福音事业虽遭皇帝禁教，耶稣会解散的不幸，天主教传统仍然幸运地在一些家庭中保留了下来。它就象埋在土地里的“种子”，数年后迎来了新

生，这批人成长为中国基督徒的支柱。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国门大开，新教在“坚船利炮”的开路下，向中国深不可测的腹地走去，穷乡僻壤之间竖起了一个个十字架，“长期被帝国智者和强者抛弃的基督徒在贫苦农民中扎下了根”。“在外国的冲击中，热爱自身文化，眷恋自给自足经济的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高涨，基督徒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教会在中国半个多世纪苦心经营所取得的进展大多被义和团运动抵消了。“以满清帝国崩溃和民族主义者的现代化努力为标志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为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内的基督徒提供了效力于国家进步的更大的可能性”。他们举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甚至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但“影响甚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教徒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七十年代末，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教会组织按照“三自”原则重新恢复，教徒的待遇得到改善。与此同时，分散于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教徒，继续保持着与外国教团的接触与交流，从而担当了一种“教会桥梁”的角色。

该书展现的中国基督徒的历史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表现在地域上。从第一个皈依的中国人出现那天起，中国教徒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流就没有中断过。早在十三世纪，中国维吾尔基督徒拉班·扫玛就出使罗马教廷，十七世纪更有黄嘉略等多名教徒随耶稣会士返欧，协助当地的学者和教士工作。中国基督徒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一点只有犹太人可与之比肩。中国传教士很早就跨出国门，在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以及更广泛的中华文化圈中往来奔走，传播福音。中国与朝鲜教徒之间的交往可追溯到两个世纪前。最感人的事件则是十八世纪末中国青年教士周文谟为保护朝鲜教徒在汉城殉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自中国的教士在履行牧师职守中起了头等重要的作用...宗教评议会实行的改革，使他们得以通过礼仪庆典及圣经学习组织把使用汉语的修会办得欣欣向荣”。欧美华人社团中的基督徒自觉顺应当地的礼仪，他们最有意义的贡献往往是在俗或在教的基督徒教授所为。他们“撰写著作，阐明自己的心路历程，从而使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时深化了自身的信仰”。开放还体现在思想上。西方教士对佛教和道教的攻击往往不遗余力，固然主要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热忱，却也反映出西方人思想中狭隘和保守的一面。中国基督徒对非教徒的敌意不是很明显，多数情况下，他们处于守势。这种行为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人固有的宗教宽容精神，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中国基督徒成长的、“有容乃大”的多元文化背景。正如沙博士本人所言“中国的遗产是天地间追求礼仪和谐的结果”。对和谐的追求使中国基督徒多了一种开放的胸襟与和平的倾向，他们欢迎虔诚善意的西方教士和宗教真善美的一面，而不是沦为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

中国基督徒来自社会各阶层，但这个群体的形成也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最初他们只是来华的波斯信教者和帝国边境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处于文明的边缘，即生即灭，谈不到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十六世纪耶稣会士来华，由于采取了适合中国礼仪的灵活的传教政策（龙华民概括为：权宜性和部分性的适应），基督教渐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第一批信徒。清兵入关，政权岌岌可危，宫墙内无计可施的嫔妃、太监宫女乃至皇后、皇帝仓皇间抓住基督这根救命稻草，妄想罗马教廷出兵拯救明王朝。这是中国教徒史中地位最高的一群人。然而，上帝也无力回天。随着明王朝的倾覆，耶稣会士归化皇帝的梦想也随之灰飞湮灭。朝代的更迭没有阻碍中国基督徒队伍的壮大，礼仪之争的恶果却断送了天主教在华的光明前程。“禁止基督徒们祭祖尊孔，迫使对

官吏和文人的归化变得更加困难”。就在洋教士的境遇变得日益困难之时，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司铎、传道员和修女们为基督教在农村扎根开辟了道路，“穷人被福音化了”，中国基督徒的队伍中增添了很多下层民众。近代新教传入再度掀起归依高潮，教徒的队伍日渐庞大和复杂。他们之中有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者、实业家和教育家，有传统天主教家庭的正宗衣钵，还有在教会学校接受过先进西式教育的学生，更有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剥削与压迫的贫苦农民。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神学家们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感到基督教必须渗入到最有教养的阶层，才能获得稳定可靠的发展，若只限于社会底层，则它的影响就是“表面的、不可靠的”。一些教会特别注意从知识分子中吸收新信徒。于是教徒的来源又有所变化。例如“在台湾教书或写作的中国教士，都是经常是光顾罗马、香港或美国高等研究机构的人”。

“中国基督徒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忠诚”。从显为人知的维吾尔族教徒拉班·扫玛历尽艰辛的朝圣之路到“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为保护西洋教士而忍受的种种磨难；从“伟大的夫人和神圣的寡妇，可以与最初几个世纪中曾帮助过罗马高级神职人员的司铎们的罗马贵夫人相媲美”的徐太夫人甘第大到第一个将基督教传播到苗人部落的殉教贞女林昭；从七旬高龄受命于危难之际，其谨慎忠实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司铎的第一位大主教罗文藻，到辛勤奔波于中国内地和世界华人社团之间的传道员，以及今天在俗或在教的为传播福音积极撰述的学者教授们，处处闪烁着中国基督徒忠诚、执着、坚忍的品质。作者对他们是满怀感情又颇为感动的。

中国基督徒热爱基督，但更爱自己的国家。综观中国基督徒的历史，我们有一种印象：他们从没有置身于国家、民族的事务之外，这种入世的精神使他们避免成为危险的宗教狂热分子，而能以务实的态度解决现实问题。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都是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徐光启“首先是一名科学家，关心国家利益。他的科学著作都以实用性为方向”，他重视历法，钻研农业技术，“对中国的繁荣昌盛深信不疑”。他还训练军队，制造大炮，提出富国强兵的策略，即使年迈多病，“仍坚持忠于其政治家和基督徒的职责”。如果说徐光启是早期中国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代表，那么马相伯可算是近代爱国教徒的典型。他一生曲折，当过矿务警察、使馆专员、商人、教育家，领导过中国基督教会的本土化运动，并促成北京第一所教会大学的诞生。“这个名字适宜于集中表达爱国主义和通过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天主教徒抛弃“唯爱主义”的观点，踊跃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天主教的著名人物陆徵祥、马相伯、于斌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教徒们纷纷组织救护团体，上前线抢救和护理伤员，并捐资捐赠支援抗战。今天，中国的天主教徒更把参加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作应尽的义务。基督教社团的名称前都冠以醒目的“爱国”二字。这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的改动，它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基督徒们的真真爱国之心与拳拳报国之志。

沙神父看到，中国基督徒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属于一个饱浸伟大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民族...如果说基督徒们已经摒弃了这些土著宗教的做法，那么他们仍然和自己的伦理、神修、甚至是在其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中，始终都与这一社会互相联系在一起。根本不需要偏爱‘文化渗透’一词，中国的基督徒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和数千年的统一与稳定，使中国人深深眷恋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他

们具有宏阔的文化气度，能吸收容纳一切外来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无一不要经过儒家文化的过滤和改造，也因此才会产生中国版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没有成为例外。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知识阶层，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基督教使命与理想化的儒家文化的和谐一致”。无论明末大学者徐光启的“汇儒超胜”，还是“穿高官服装的传教人”杨廷筠苦心经营的“仁会”；无论太平天国理论家“中国版的耶稣——皇上帝”[4]，还是喧嚣一时的容纳基督精神的“新生活”运动；无论马氏兄弟的奔波旋走，还是台湾基督教学者对基督精神与儒家文化关系的一次次热烈探讨，无不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求中国文化与福音的结合。这种良苦用心与依恋传统文化的情结使他们对西方传教士著作的观点并不亦步亦趋，随声附和，而对宗教学遗产进行选择，翻译和撰写最适合中国天主教徒心态和需要的作品。因此可以说，中国基督徒仍然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反过来他们又以独特的方式丰富了这一多元的文化体系。

中国基督徒的历史仍然在发展，教会的本土化推进了这一进程。面对着工业化发展和社会变迁为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带来的冲击，基督教会更加关注许多棘手的问题，研究实际方法、寻求解决途径。台湾的修女大声呼吁“教会再也不能闭着眼睛了。否则，我们越是前行，就越会陷入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的道路。到那时，福音布道将变得日益困难。”新的形势给教会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现代人的“双轨制”[5]追求使人渴望过有信仰的生活，人有了信仰，有了上帝的庇护。才会受到“终极关怀”，才不至于掉进现代文明危机四伏的深渊。

沙百里神父撰《中国基督徒史》，正如译者耿昇所言“可谓内行人讲内行话，颇有见地”。一本三十多万言前无古人的《中国基督徒史》出自外国人之手，资料丰富可靠，评价客观，已实属不易，再吹毛求疵确有为难之嫌。然而，掩卷默想，还是有一些遗憾与迷惑的。之一，他过多地描写了中国基督徒对西方教士的尊重与服从，较少涉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西方教士把上帝介绍给中国人，但又不希望中国人与上帝靠的比他们更近。这种矛盾注定了双方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仅以中国基督教徒为教会本土化努力的过程为例。遥想前清初年，罗马教廷公布对第一位中国主教任命之时，不少外籍教士以中国人不胜此职而不愿为之祝圣^⑥，到近代马相伯、英敛之以来由下而上的改革教会的议论转化成刚恒毅枢机至上而下的行动，直至1926年中国六位主教在罗马的声光动人的漫长过程一定发生了很多摩擦和冲突，而它们恰恰构成了近代中国基督徒史的主线，是不能回避而应大书特书的。之二，此书对基督徒历史大发展的近代记述稍显简单，详略分配略有不当。近代历史上的天主教著名人物马相伯，英敛之，于斌着墨较少，而对徐甘地大的记述则不遗余力，如果说因为后者颇具典型性所以浓墨重彩，那么贵州、遵义的殉教人无论对宗教事业的贡献，还是当时的影响都无法与前几位相提并论，却也煞费笔墨就令人费解了。之三，一些评价稍显草率，原因推测的太过简单。如认为马相伯一度脱离教会的理由竟是“对翻译出版工作恼火，并认为耶稣会士的欧式伙食难以下咽”，这位人物后来的种种表现令人不得不对这个断言产生怀疑。最后，一些小的疏忽虽无伤大雅，也终究显出西人撰写汉学作品的通病，如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子的疏忽，沈濯是宦官迫害狂的夸张等等。当然瑕不掩瑜，这些小缺漏丝毫无损这部作品的成功。我们对沙博士对此研究领域所做的开创性

贡献是满怀敬意与感谢的。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未曾开启过的大门，中国基督徒第一次从幕后走到了幕前，成为一种历史的主角。抬眼望去，这边风景独好。

【注释】

- [1]《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331页，转引自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504页。
- [2]《中国基督徒史》中译本序。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内容均出自《中国基督徒史》。
- [3]陈垣《基督教入华史》，《陈垣学术论文集》。
- [4]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37页。
- [5]《论人性的三个基本特征》，《文史哲》，1996年第5期，20页。
- [6]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303页。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辞书室
(责任编辑：罗国祥)

法兰西文化卡片

法兰西共和历

法兰西共和历，又叫法兰西大革命历，是在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采用的历法，现在已经废止。但是当时的很多历史事件都是用这种历法记载的，比如“雾月政变”等。法兰西共和历是由国民公会所实施的最大的改革政策之一，目的在于通过改变时间与空间的参照物来最大限度的改造整个社会。它反对迷信，反对崇拜，反对礼拜日，反对圣人，宗教节日也以理性、科学、自然、诗意、思想和乌托邦的名义被废止。

大革命使法国成为一个非宗教的国家，这个历法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同与基督教紧密联系的公历（格里高列历）区分开来。

新历法的结构是由Gilbert Romme创造的。根据这个新历法，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每个月分为3周，每周10天，废除星期日，每年最后加5天，闰年加6天。

每个月和每一天的名称是由一名叫Fabre d'Églantine的诗人在一名叫做André Thouin的园丁的帮助下设计完成的。每个月名称根据法国的气候或者农业生活中重要的时期来命名，比如说12月叫雪月，因为12月会下雪；9月叫葡月，因为9月是葡萄收获的时期。设计者希望这部历法能“通用”，并且和法国以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历法所遵循的基本规则：

- ◆ 共和历从1792年9月22日开始纪元，即共和国宪法实施的第一天，也是秋分。
- ◆ 每年的第一天都是从秋分那一天开始，秋分要照巴黎所处的经度计算。
- ◆ 每一年被分成12个月，每个月30天，另外加上5或6天，称作“补充日”（人们简单的称这些日子为“无套裤汉日” Sans-Culottides）
- ◆ 被称作“革命日”的补充的第六天，每四年才加一次，也就是逢闰年加一次，闰年叫做“sextile”，每四年的时期叫做“franciade”。
- ◆ 每个月分成三旬。

风景这边独好——读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

作者：[郭可](#)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辞书室](#)
 刊名：[法国研究](#)
 英文刊名：[ETUDES FRANCAISES](#)
 年，卷(期)：2008，”(1)
 被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7条)

1. [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2.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3. [中国基督徒史](#)
4. [陈垣 基督教入华史](#)
5. [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
6. [论人性的三个基本特征](#) 1996(05)
7.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季玲 基督教文学的路径描述——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生存困境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5(3)

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即是否基督徒的作品就是基督教文学和是否非基督徒的文学作品就不是基督教文学,我们可以描述出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类型:基督教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教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前者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信仰之言,后者则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但两者都注重用个体的生命来关注和表现大生命气息,这也是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基督教文学所遭遇的两大生存挑战使之至今还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它依然是一种等待别人关注的边缘文学。

2. 期刊论文 [中国基督教第七次代表会议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天风2002, ”\(7\)](#)

中国基督教第七次代表会议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对工作报告所作的五年工作回顾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会议认为过去五年的工作,方向明确,积极有效,以总结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的经验,与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事工作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中国教会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为今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学位论文 [肖会平 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在华活动研究——从中国共和大学中心办公室到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1922~1951\) 2008](#)

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下文简称“合作组织”)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西方基督教会、中国基督教大学西方托事部在北美联合发起的一个具有基督教性的高等教育服务管理机构,主要满足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共同需要以及在北美提供联合支持和指导的需要,最终达到“中国基督教化”目的。该组织及其对华服务活动属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留下不少高等教育管理经验与教训。本文以历史文献方法为主-辅以比较研究法、计量分析法,立足于“合作组织”的原始档案,全面系统考察了该组织的成立背景、历史变迁、职能与结构演变、服务活动及主要社会关系,并尽量给予客观评价。希望借助这项研究,丰富深化人们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和西方教会的认识,为当今的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合作组织”成立的背景、经过及历史变迁,揭示了它成立的动因、目的和机构性质。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北美基督教传教运动,当时很多新教传教士响应“中华归主”的号召来到中国,热心从事基督教大学的创建工作。由于行动匆忙,缺乏组织协调性,又没有整体计划,基督教高等院校常常出现资源供给不足和激烈竞争;中国本土高等院校的迅速崛起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向基督教高等院校提出严峻挑战、施加巨大压力。内忧外患迫使西方教会及其基督教大学走上合作办学之路。“合作组织”就是它们合作的产物,反过来又推进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运动走向全面深入,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它的工作职能、组织结构、服务方式、社会关系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唯有基督教性质和宗教目的始终未动摇。

合作与支持这两个相关问题贯穿“合作组织”对华服务30年的历程,合作与支持这两大类行动始终以“强化基督教大学的宗教性质和传教功能”为宗旨。“合作组织”谋求合作,促进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其职能、结构和运作方式适应合作运动的需要而演变;中国共和大学中心办公室仅是大学的北美共同办事处,主要根据成员大学托事部的指示和委托联合处理它们在北美的部分行政事务,通过合作方式促使基督教大学更高效化、更基督教化。合作的确缓解了大学之间的竞争、减少了工作上的重复。尽管中心办公室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但它展示的合作优势诱导西方教会、基督教大学及其托事部继续探索更有效的合作方式。经过近10年的讨论酝酿,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终于成型,代替了中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吸收了中心办公室。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由不同托事部组成的顾问性质的松散联合体,按照各大学托事部的授权契约,统一负责13所大学的绝大部分北美行政管理,在北美为西方教会的监督和控制,对西方教会负责。制定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规划与政策,其目标就是联合北美的所有支持力量,服务于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广泛合作行动降低了办学成本、提高了教育效率,扩大了学校规模,增强了办学实力。基督教高等教育界一边享受更多的合作实惠,一边寻求更彻底的合作途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单独的法人团体,有权作出某些独立行动,能更经济更有效地处理有关事务,为所有参与合作的大学服务,确保西方教会在大学的宗教利益最大化。支持基督教大学的发展是“合作组织”的中心工作,也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为实现大学创办者的宗教理想,它开展了大量的对华服务活动,归纳起来有四大类即行政管理、筹集资金、制定发展规划和对大学宗教工作的系列援助。这些管理服务活动虽然各有侧重,形式也不同,但几乎都蕴涵着强化大学基督教性质的动机:派遣的教职员必须是基督徒或具有明确的基督教目的;尽量争取基督教途径的资源、控制非基督教渠道的资金募集比例;“使大学更加基督教化”一直被奉为教育政策与计划制定工作的。

“合作组织”作为西方教会在华高等教育代理机构,人事上和经济上依赖西方教会,行政上从属西方教会,在西方教会的政策框架下实施合作与支持行动,并接受西方教会的监督和控制,对西方教会负责。在追求对华服务的最佳效果中,“合作组织”逐步适应了中国政府的政令要求,其合作与支持工作赢得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双方还合作开展了不少基督教高等教育项目。“合作组织”卓有成效的对华支持工作吸引了很多美国高等院校的参与,它们因此加强与中国基督教大学固有的交往关系,或建立新的合作搭档,或提供新的援助。中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运动

在中国取得的组织成果，最关注的就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问题，一直协同“合作组织”推动中美两地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运动，成为“合作组织”的最佳合作伙伴。

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合作组织”的服务宗旨始终不曾动摇，即它的所有合作与支持几乎均以“强化基督教大学的宗教性质”为轴心，一切对华服务都是为了让基督教大学更基督教化，最终发展基督教福音事业。然而，因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国立大学的竞争和挑战、以及受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基督教大学越来越中国化和世俗化，同时专业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其基督教性质不可遏制地淡化，导致日益胜出的基督教大学教育目的与“合作组织”一直神往的宗教目的相背离，最终“合作组织”的对华服务所产生的福音效果远不及它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大。基督教大学正因为“合作组织”的全面支持与合作行动，才在后30年里历经许多艰难挫折而全部幸存下来，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合作组织”在加快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和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中国基督教福音事业也发挥了有限的推动作用。

从对“合作组织”的历史回顾与考察，不难发现一个带有共性的社会现象，即一个国家的教育管理服务组织要对身处他国的教育机构发挥影响作用，必然要受他国社会条件的制约，合乎他国社会实践的需要，同时要遵循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否则，什么目的都很难达到。

4. 期刊论文 [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 天风2008, "" \(3\)](#)

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5. 期刊论文 [田丰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第六次主席、会长会务\(扩大\)会议在沪举行——中国基督教有望产生主教 - 天风2004, "" \(11\)](#)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第六次主席、会长会务(扩大)会议, 于2004年10月10日在上海九江路219号中国基督教两会会所举行。

6. 期刊论文 [王荣伟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 天风2007, "" \(1\)](#)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于2006年12月2日-4日在沪举行。全国两会常委、咨询委员会正副主任及在沪的全国两会委员出席、列席会议。

7. 学位论文 [刘海涛 透视中国乡村基督教——河北乡村基督教的调查与思考 2006](#)

地球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性、脆弱性, 使得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整体, 几乎没有可能享受到以大量物质消耗为基础的富裕生活, 但他们依然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 这种生活不是以占有物质多少来确定人的价值, 而是以人是否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平等相处、和谐共存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为此目标, 农民观念之转变、乡村文化之转型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 笔者生、长于华北内陆农村, 在耳濡目染农民无穷智慧的同时, 也深深体悟到乡村文化中亟待完善之处颇多。

中外历史表明: 宗教对民族群体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的转型具有较强的冲击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宗教中往往包含着一个民族最深藏不露却又影响广泛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文化积淀, 是文化体系中的深层核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的基督教, 在中国尤其是乡村的传播呈方兴未艾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折冲碰撞, 更令我们看不到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减缓或停止的迹象, 某种意义上是继佛教传入以来乡村文化受到的第二次冲击。那么, 基督教在乡村迅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基督教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 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文化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内涵或新鲜活力? 换言之, 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中所倡导和实践的一切, 蕴涵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 这种理念和精神会对中国乡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同时, 基督教又被进行了怎样的“改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大规模基督教皈依运动, 使很多学者对基督教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 这些研究多从文、史、哲的角度进行, 近年来, 注重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宗教社会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起始阶段。笔者力求以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对中西宗教比较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理论指导, 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所发展出来的不同方法, 对河北乡村基督教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从宏观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导论), 这部分从总体上对本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初步的阐释和说明。这些问题大致是: 一、为什么研究基督教? 二、为什么要研究乡村基督教? 三、为什么研究中国的乡村基督教? 然后简要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 之后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 最后, 简要说明本项研究的结构安排。为了让读者对本研究的调查地点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笔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一、二章)对本研究对象进行简要介绍, 先追溯基督教在当地传播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轨迹, 然后描述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现状。第三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本文的核心, 主要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第三章探讨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的原因, 在分析学者的解读与教内人士诠释的基础上, 提出个人浅见, 认为基督教自身所独具的一些特点以及农村社会的乡土性是基督教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第四章分析基督教对当地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 认为其作用主要包括: 更新个体的思想观念、转变群体的人际关系模式、冲击传统的民间宗教等。第五章探析民间宗教对基督教的影响, 认为当地基督教虽然带有一定的民间宗教色彩, 但在总体上看, 其自身的特色是鲜明的。第六章阐释当地政教关系, 在描述当地政教关系现状的基础上, 剖析其原因, 认为当地政教关系比较紧张的主要症结是交流与沟通的缺乏, 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第四部分(余论), 笔者在分析农村基督教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后, 对基督教在乡村发展的前景进行分析与展望。

本文认为, 从总体上看, 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发展基本保持了自身的特色, 也为该地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互补作用。展望未来, 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发展既有机遇, 也面临着系列的挑战。但无论基督教面临何种机遇与挑战, 基督教信仰者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多不会超过四分之一。理由主要是: 在北美, 众多的中国年轻学子跨越重洋, 远离家人和朋友, 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陌生环境中苦苦奋斗。当地的教会针对这些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以吸引他们加入自己的教会, 同时, 这些人多数是学习理工科的, 受到的原生地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要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基督徒也大约只占四分之一, 还有很多人不加入教会。

8. 期刊论文 [王奇昌, Wang Qichang 大陆农村基督教面临的困境以及列文森的洞见——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之《儒教、基督教与中国的选择》有感 - 科学与无神论2009, "" \(6\)](#)

本文结合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对中国基督教尴尬处境的洞见, 以对河南省南阳市一村庄基督教的调查为例, 指出当前大陆农村基督教之所以面临一直进入不了社会主流的困境, 并不是其与中国传统相违背, 而是因为基督教不是科学而被其他村民蔑视和不理。

9. 期刊论文 [王三三, WANG San-san 基督教四入中国及其特点初探 -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 27 \(4\)](#)

基督教自产生、发展约六个世纪后便与中国开始了接触。历史上, 基督教曾四次入华, 先后经历了唐、元、明末清初以及近代初期四个传播时段。

10. 学位论文 [马超 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为个案 2003](#)

该文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为研究主体, 考察它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基督教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作为历史背景, 研究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基督教关联机构, 在运动中如何对社会“挑战”做出回应。将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作为时间点, 勾勒出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一时间点前后的命运发展和事业起伏, 着重探究基督教青年会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诱发因素, 以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事业的深远影响。文章通过对非基督教运动前后,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命运的关注, 来揭示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会、尤其是对基督教青年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并从侧面考察非基督教运动对教育、青年运动的方面的重要意义。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gyj200801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f9235f7-3416-4242-9d66-9e4d00927d2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